

商周青铜艺术

商周时期的青铜人像

李歆琰 毕经纬



三星堆遗址
出土跪坐人像
(作者供图)



茹家庄遗址
出土青铜男子像
(来源: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官网)

商周时期的先民铸造了难以计数的青铜器,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这些青铜器的种类繁多,人像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类。作为人创造出来的“人”,人像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自身、自然界以及精神世界的认知,是探讨当时社会、思想与文化的重要媒介。

造型与内涵

商周时期的青铜人像造型丰富,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单体人像和人兽一体像。单体人像的身份大体可分为巫师(神人)与奴隶。巫师(神人)像大量发现于南方,以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数量最多。巫师(神人)像主要有跪坐与站立两种,显示出不同的身份特征或祭祀仪态。跪坐人像体量一般较小,身着短衣或赤裸半身,部分头戴冠饰,举有牙璋或青铜尊等礼器,应是安坐受祭的神像或正在举行仪式的巫师;但反缚手臂的跪坐人像则可能是地位低下的奴隶或俘虏;此外,部分跪坐人像出土时有烧灼痕迹,可能是祭祀时的“人牲”。站立人像数量较少但体量较大,人像多髻发,头戴高冠,双手环握于胸前,应是地位较高主持祭祀仪式的巫师或神人的形象。中原地区如宝鸡茹家庄出土铜人像造型与之大体相同,但无面具,面貌也更似常人。商至西周时期的青铜奴隶像形体普遍较小,造型以蹲、跪为主,双手多作背负载,多作为盘、盂、鬲等容器的器足或器物的附属装饰,其身份应是从事劳动的奴隶、仆从、俘虏等地位低下之人。另有一类较为特殊的“别人”像,如宝鸡茹家庄出土的别人守门方鼎和闻喜上郭村出土别人守门挽车,受过“刑”的人蜷缩于门下作为器足,此类人像流行时间较短,多见于西周时期。东周时期的青铜奴隶像造型出现变化,常见奴隶或仆从手持灯柄、盘柄或头部顶部等形象。人兽一体铜像可分为人兽相伴和人兽融合两类。相较于单体人像,这一类铜像在商周时期更为常见,青铜容器、兵器与车马器上均有发现。题材上,多见人虎一体形象,如龙虎尊、虎食人卣等。此外,还有人蛇一体、人鸟一体等形象。通常表现为人首与兽头相叠,或某部位形变为兽态(离态)等,呈现诡异狞厉之感。关于人兽母题的文化内涵,学界多有争论。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张光直“巫觋通天说”、李学勤“神人合一说”、马承源与何新的“巫觋辟邪说”、巫鸿的“威吓说”、潘守永与林河的“人兽合说”等。不论其真正内涵如何,人兽一体铜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崇神尚力的思想倾向。至东周时期,这一思想发生较大变化,出现了骑骆驼、骑马等骑乘动物的铜人像,往日凝重的人兽一体形象逐渐减少,表现日常生活中人与动物互动的场景随之流行起来。

渊源与演变

商周青铜人像的表现形式,可追溯到史前艺术中的人物形象。从岩画以及各类泥塑、陶塑、玉石雕塑可以看出,史前人物形象大多重在突出典型特征,大胆取舍,肆意夸张。这一风格延续至商周青铜人像上,造就了不刻意追求人体比例和细节而着重强调思想内涵的特点。在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商周青铜人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人像的数量与类型均较少,除三星堆有较多的制作精细的单体人像外,其余人像多作为兵器和容器的附件,如剑身末端、匕首柄部以及斧、钺、车器的装饰,形象多较粗糙,造型夸张诡诞,并多与动物相结合。西周中晚期,青铜人像明显增多,形态也更为多样,形象更为写实,单体人像多为跪坐、负重、守门的奴隶形象,主要装饰在器物的耳部、足部、鬻手等;人兽一体像多装饰在车器、兵器等器物之上。东周时期的人像,形态更加丰富,人物形象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往常见的人兽一体怪诞形象被骑乘动物的人像所取代,作为器足与别人守门的奴隶形象被站立擎物的仆佣所替代,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写实,一改往昔的庄严肃穆之感,而富有生活气息。这一演变过程,既是时人思想逐渐“祛魅”的写照,也反映了古代中国艺术范式的变迁过程。商代先民认为只有拥有强大力量和特殊能力的巫师才有沟通天地的能力,故而铸造出想象中的神兽与巫觋以沟通天地。神灵、两周时期,鬼神祭祀在政治文化中虽然仍占有重要地位,但实践的重心已经开始转向世俗世界的德行与人事,六礼围绕人的生命过程展开,礼乐文化在本质上也不再是神的他律,而是立足于人与社会的组织结构。在此背景下,青铜人像的社会功能逐渐超过宗教功能,呈现出回归世俗社会的趋势。

分区与特征

由于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的不同,商周时期的青铜人像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大致可分为中原、南方、北方三大区系。中原青铜人像主要见于河南、陕西以及山西、山东、河北等地,罕见单体人像,流行负重、持物、擎物的奴隶像,多见于容器、车器、兵器的附属装饰,比如天马-曲村、闻喜上郭村、翼城大河口、平顶山北澧村、曲阜鲁国故城、枣庄东江等遗址出土青铜器上的负重奴隶像与别人守门像。比较有特色的还有鲁东南莒国墓葬出土的裸人铜方鼎,六个裸人作为承重的器足,鼎盖上铸裸体男女各一人为盖钮,富有地域特色。除此之外,北京一带的燕国所出青铜人像多以头部为主,而陇东与关中西部则有一些蹲坐捆绑人兽和人兽像。南方多见单体青铜人像,主要用于祭祀活动,多发现于山川河流附近的祭祀坑之中。这类青铜人像主要发现于长江流域,可能反映了这一地区存在相近的宗教信仰,但不同地区也有一些差异。长江上游多见单体青铜人像,集中发现于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人像以凸目、大手、尖耳为突出特征,身着特殊的衣冠,并融合大量仿生或抽象的动物、太阳、山川等形象。这类人像与神树、祭坛一同呈现的仪式景观,可以视作成都平原“中心祭祀”情景的再现。长江中游常见青铜质地的人面装饰和人兽一体容器,比如新干大洋洲、随州叶家山出土的青铜双面人头像、湘江流域的大禾方鼎、虎食人卣等,人像波眉披发、鼻梁尖削,耳垂穿孔,服饰为短褂、束腰、窄袖。长江下游吴越和百越地区的青铜人像出现时间较晚,集中出现于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如绍兴头山出土青铜鸟杖下部跪坐的人像,人像周身饰有花纹,或许体现了越地“断发文身,以像龙子”的习俗。皖南地区出土有跪坐人像和人像形态的器物附件,广东多见人首柱形器,常作为车器、兵器、棺架、杖首、礼器的装饰,或是古代越族人猎头习俗的反映。云南地区的青铜人像出现更晚,形态也更丰富,有单体人像、骑马人像、狩猎人像、人面等,常作为贮贝器、扣饰、仪仗、兵器、工具的装饰。此外,还有手持招魂伞的青铜人像。北方地区主要指长城沿线及其附近地带,大致涵盖内蒙古与青甘宁大部分地区、陕北北部与冀北等地区。北方地区的青铜人像常作为兵器、工具、装饰品的附件,早期多为站立或骑马形象,人像五官粗糙,部分人像右手持物于胸前,头上有尖状铜胄式饰物;部分人像双手合于胸前与颌部连接形成圆孔,意似手持绳结。稍晚时期还出现二人角斗像、狩猎像、人兽搏斗像、武士捉俘虏像、车夫驭车像等,是草原民族的生活写照,这类青铜人像在欧亚草原多有发现。北方各地青铜人像形态较为接近,但面部特征略有差异。宁夏、甘肃、青海等西北地区所出人像高鼻直贯额间,颧骨突出;东北人像狭面高鼻,颧骨外扩;鄂尔多斯地区人像则圆脸矮鼻,可能代表了不同的人种。上述三个区系的青铜人像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其共性主要表现在,三地人像均有作为兵器、工具、装饰品和容器附属装饰的情形。但其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原青铜人像常以器物的附属装饰存在,南方青铜人像多呈单体形态或人兽一体形态,北方青铜人像则常见乘骑马匹、人兽互搏等形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大区系人像都呈现出逐渐“祛魅”的趋势,越来越富有生活气息,在题材上也呈现出趋同的态势,形成了三地青铜文化交流融合的图景,见证了中国青铜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

商周青铜器上的八角星纹及相关问题

吴雅彤



八角星纹图像示例 图1. 洪江高庙陶器 图2.B型八角星纹(灵石旌介M1:38) 图3.B型八角星纹(灵石旌介M1:37) 图4.A型八角星纹(小屯M20簋饰) 图5.A型八角星纹(小屯M20钺首饰) 图6.A型八角星纹(后刘家塔墓地M1八角星纹饰) 图7.A型八角星纹(小屯M20铜泡)

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陕北地区商代考古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清涧县寨沟遗址成为陕西高原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遗存最为丰富的商代遗址,尤其是所发掘的后刘家塔梁梁墓地,虽被严重盗扰,但仍发掘了甲字形大墓1座,竖穴土坑墓3座,并出有铜、金、陶、玉石等各类随葬品二百余件,信息量巨大,令人瞩目。引起我们注意的是M1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八角形器。八角星纹在新石器时代便开始流行,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八角星纹见于高庙遗址下层出土的一件陶器上,环带状纹饰中,有一八角星纹,系为戳印戳点连续而成(《洪江高庙》,科学出版社,2022年),该八角纹的构图和制作技术简单原始,年代约距今7800年(图1)。而进入青铜时代后,八角星纹的流行年代主要集中于晚商至西周早期,分布时段与地域均具有一定特点。本文将对商周青铜器上的八角星纹做一简单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首先,根据形制与表现技法,可将收集到的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八角星纹分为两型:

A型 八角星纹中间为两重凸弦纹同心圆。主要包括安阳小屯M20中出土的数量众多的八角星纹圆铜泡,铜泡形制为中间两层同心圆,外围为八角星形,其内用各种样式的绿松石填平,出土时多数绿松石已脱落(图7),这些铜泡结合出土位置判断应为车上的装饰品,此外,M20中出土的车马器和车马首的器顶也见到了镶嵌绿松石装饰的八角星纹(图4、图5)。M20还出土了一件弓背上饰八角星纹的弓形器(《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一·北组墓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安阳大司空村车马坑M175中出土的两件弓形器,弓背中部饰八角纹(《考古学报》,1955年第1期)。此外,大司空M303也出土了一件弓身中部上饰两重同心圆,其外饰八角星纹的弓形器(《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安阳市殷墟范家庄东北地M4出土一件弓形器,弓背有八角星纹,中部有两重圆(《考古》,2009年第9期)。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了三件弓背饰八角星纹的弓形器,其中M132:6的八角星纹呈凹形,纹饰内填绿松石片,星纹中央有一梯形圆台,台中饰有圆形孔(《滕州前掌大》,文物出版社,2005年)。以及寨沟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八角形器(图6)。年代为殷墟二期至西周早期。

B型 八角星纹中间为一凸圆点纹,外有一重凸弦纹同心圆。主要包括安阳殷墟郭家庄M160的1件弓形器,弓身中部有一圆形凸泡,其外饰八角星纹(《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安阳市梅园庄东南的车马坑M41出土一件弓身中部有八角星纹的弓形器(《考古》,1998年第10期)。灵石旌介墓地M1、M2各出土两件弓身中部外侧饰八角星纹、八角星纹中间为圆形凸起的弓形器(图2、图3),其中M1:38弓形器上的八角星纹饰可以说是B型八角星纹饰的进一步简化,中间的凸圆点纹已不见,仅剩一重凸弦纹同心圆(《灵石旌介商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宝鸡石鼓山M3出土一件弓形器,弓身表面正中有一圆形突起,圆形外饰八角星纹(《文物》,2013年第2期)。年代为殷墟三期至西周早期。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还发现了几件饰八角星纹的弓形器(《三代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但由于没有具体器物图片,难以判断纹饰类型,故不对这一部分商周时期的八角星纹进行分析。

综上,A型八角星纹装饰的出现年代稍早于B型八角星纹装饰,但两者整体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其中A型八角星纹装饰与史前时期的八角星纹的构图更为接近,可能是受史前八角星纹图像的启发,并在此基础上镶嵌绿松石装饰,形成了具有商文化特色的八角星纹。B型八角星纹应该是在A型八角星纹基础上的一种创造和调整,在B型八角星纹上已不见绿松石的装饰,B型八角星纹整体纹饰近似太阳纹。

其次,从地域分布来看,八角星纹主要是零散分布,其中河南安阳地区是八角星纹分布最集中的区域,小屯、大司空村、梅园庄、郭家庄、范家庄等均见有八角星纹,且主要以A型八角星纹居多。此外,山东滕州前掌大、山西灵石、陕西清涧和宝鸡石鼓山也都出土了带八角星纹的铜器。从八角星纹的时空分布情况来看,带有八角星纹的青铜器最早出现于河南安阳地区,且发现集中,故安阳地区可视为商周时期八角星纹的核心分布区,在安阳地区以外的山东、山西、陕西等地铜器上的八角星纹装饰可能是由安阳地区传入或受商文化影响而出现的。通过现有考古资料可以看到,安阳地区及其以东的山东地区主要流行A型八角星纹,安阳地区西北的山西、陕西地区则更倾向B型八角星纹,故合理推断镶嵌绿松石装饰的A型八角星纹产生于安阳地区,镶嵌绿松石装饰的八角星纹图像应属于商人传统,B型八角星纹可能产生于商文化主体范围的西北部,是在A型八角星纹基础上改造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纹饰风格,其后这种风格又影响回安阳地区。

同时商周时期的八角星纹能够发现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些八角星纹装饰全部应用于车器上,目前见到的数量最多的饰有八角星纹图像的青铜器是小屯M20出土的铜泡,其次是弓形器、车马、车马首和车马首的器顶,其中小屯M20的八角星纹铜泡通过出土情境分析,推断其主要是车马上的装饰品(《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一·北组墓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由此推断,商周时期的八角星纹图像是车器的专有纹饰,主要应用于车器之上。

最后关于八角星纹的含义,有太阳崇拜与原始巫术、天圆地方和表示方位、原始日晷、龟甲、织机等说法(《南艺学报》,2010年第1期)。从商周时期八角星纹的构图来看,八角星纹的图案是以中间的同心圆为中心,呈放射性的构图,整体来看有点像太阳纹的一种意象化表现。商周时期青铜器上八角星纹的图案是上下、左右轴对称图形,较史前时期相比,构图更为规整和严谨,再结合这种八角星纹图案仅应用于车器上,故推测商周时期的八角星纹可能与表示方位有关,据研究,典型的八角星纹是具有方位象征的基本意义的(《中国史前八角星纹的图像分析与阐释》,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总的来说,商周时期青铜器上所见到的八角星纹装饰主要有两类,其中镶嵌绿松石、中间两层凸弦纹同心圆的八角星纹是商人传统,最新报道的后刘家塔M1的八角形器很有可能就来自于安阳地区;另一类八角星纹中间为圆形凸起,外有一重凸弦纹同心圆的型式可能是受到商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纹饰。八角星纹图像在商周时期仅应用于车器上,可能具有方位象征。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宁城南山出土男女并立铜剑 来源:内蒙古博物院官网